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八編 13

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發展與變異

以孔教報爲主要分析對象(1936~1938)

江啓綸·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刊 編輯

八 編

第 13 冊

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發展與變異
——以孔教報爲主要分析對象 (1936 ~ 1938)

江 啟 綸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發展與變異——以孔教報為主要分析對象（1936～1938）／江啟綸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4+226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八編；第 13 冊）

ISBN 978-986-404-439-9（精裝）

1. 儒學 2. 日據時期 3. 臺灣

733.08

104015139

ISBN- 978-986-404-439-9



9 789864 044399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八 編 第十三冊

ISBN：978-986-404-439-9

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發展與變異 ——以孔教報為主要分析對象（1936～1938）

作 者 江啟綸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169120 字

定 價 八編 29 冊（精裝）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發展與變異
——以孔教報爲主要分析對象（1936～1938）

江啟綸 著

作者簡介

江啟綸，筆名寧野，男，1980年6月20日生於臺灣彰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曾任教於新北市鶯歌國中、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新北市立新北高中，現任教於國立臺中家商。臺灣師大臺灣文學研究社創辦人，詩作曾入選2000年網路詩選，研究所時期曾獲賴和論文獎，成大鳳凰樹文學獎，高中時代曾獲第六屆彰中彰女聯合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大學時代曾獲第六屆臺灣人文研究學術獎文學類大學生組第三名、師大紅樓文學獎。有志於從事臺灣文學教育、文學創作與教學、文化評論研究等諸面相發展。

提 要

本文藉著對於中日儒學史的回顧，剖析兩者對於臺灣儒學思想的影響，並且將之聚焦於殖民性（coloniality）／近代性（modernity）／本土性（nativity）等面向，最後將本文主要探討的分析文本——《孔教報》放入臺灣儒學史脈絡中加以討論。首章即說明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寫作動機與目的；第二章則論述自臺灣文獻初祖沈光文以來迄清領末期，臺灣儒學的發展與建制，並以新史料的發現，重新定位沈光文在臺灣儒學史的地位；第三章則主要以上述三個面向思索日治時期臺灣儒學思想的發展與變異，藉著說明日本近代儒學的發展對臺灣的影響，闡述日治時期臺灣儒學的因應策略及多種類型；第四章則透過整理與表列《孔教報》主編—施梅樵與相關人物的生平資料，及其於《孔教報》當中的論述，並以「儒學與近代性（modernity）」、「儒學與殖民統治」以及「儒學大眾化」等角度，對於《孔教報》的儒學意涵加以解析；末章即論及《孔教報》的貢獻與價值，以及本文研究之價值與不足之處。

本文嘗試以臺灣儒學史相關論述為文本，以後現代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轉向論等理論為分析工具，呈現日治時期臺灣儒學的發展與變異，及《孔教報》的儒學意涵並點明其價值與歷史地位。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標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5
一、研究範圍	5
(一) 關於官方儒學論述	5
(二) 關於士人的儒學論述	6
(三) 關於庶民的儒學論述	6
二、研究方法	6
(一) 蒐集原始資料	6
(二) 進行田野調查	7
(三) 掌握歷史脈絡與背景	8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8
一、《孔教報》的研究成果回顧與檢討	8
(一) 在單篇論文方面	8
(二) 在學位論文方面	8
(三) 在專書方面	9
二、「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研究成果回顧與檢討	11
(一) 在單篇論文方面	11
(二) 在學位論文方面	12
(三) 在專書方面	12

第二章 明鄭迄清末臺灣儒學的起始與建制	15
第一節 臺灣儒學之肇始	15
一、明鄭時期以前的臺灣	15
二、沈光文在臺灣儒學史的歷史地位	18
（一）沈光文的正面評價	19
（二）沈光文的負面評價	21
（三）後現代歷史思索與沈光文在臺灣儒學史的再評價	25
第二節 明鄭時期臺灣儒學建制	29
一、明鄭政權與儒學	29
（一）晚明實學發展歷史脈絡下的明鄭儒學	30
（二）嚴守儒家《春秋》華夷之辨的延平二王與明鄭諸遺老	31
二、明鄭時期的儒學建制	37
第三節 清領時期臺灣儒學論述與建制	39
一、清代臺灣儒學教育建制	42
（一）就學規而言	43
（二）就碑文而言	45
（三）就祭祀而言	47
（四）就教學內容而言	48
（五）就教學者出身與事蹟而言	49
二、清代臺灣儒學與閩地朱子學的辯證關係	50
第四節 小結	53
第三章 日治時期臺灣儒學論述	55
第一節 前言	55
一、「殖民性」與「現代性」和「本土性」的辯證	55
二、掙脫抗日/御用及新/舊文人的二分法	58
第二節 日本近代儒學與臺日儒學社會之差異	59
一、日本明治維新以前的儒學發展	59
（一）江戶迄幕末日本朱子學的發展	59
（二）江戶迄幕末日本陽明學的發展	64
（三）近世日本儒學社群知識建構的兩個方向	66
二、日本明治維新後之儒學發展	69

(一) 幕末儒學觀點的影響	70
(二)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孔子教運動	73
第三節 日治臺灣儒學社會的時代背景	80
一、西方近代化思潮的衝擊及影響	80
二、日本的臺灣殖民地文教政策	82
(一) 日本的殖民統治	82
(二) 日本殖民下的文化與教育政策	86
第四節 臺灣儒學的「現代/殖民/本土」分析	101
一、掙脫日治時期儒學肯定論與否定論的夾殺	101
(一) 日治時期儒學肯定論	101
(二) 日治時期儒學否定論	103
(三) 以「轉向」概念反省臺灣儒學肯定論與否定論	104
二、日治臺灣儒學論述類型	106
(一) 回歸傳統儒學價值	106
(二) 對於殖民近代性的因應與解讀	110
(三) 回歸臺灣本土性的路徑	126
第五節 小結	129
第四章 《孔教報》儒學意涵之分析	133
第一節 前言	133
第二節 創立動機及其組織活動	136
一、創立動機	136
二、孔教報出版會同人的組織活動	138
第三節 《孔教報》相關人物生平傳略	140
一、施梅樵生平	141
二、《孔教報》相關人物名單及其生平概要	144
第四節 《孔教報》儒學論述解析	162
一、儒學與近代性的互動	164
二、儒學與殖民統治	167
三、「儒學大眾化」的嘗試	171
第五節 小結	175
第五章 結 論	177
第一節 《孔教報》的貢獻與價值	177
第二節 本篇論文的展望與檢討	179
參考文獻	181

附 錄	191
附錄一 沈允在先生編《沈光文公來臺世傳族譜》	193
附錄二 《孔教報》之目錄	205
附錄三 《孔教報》所刊作者之創作次數及其頁碼 索引	213

表目錄

表（一）明鄭時期諸遺老生平一覽表	34
表（二）清代儒學教育中學齡對應於教材之進度表	48
表（三）《孔教報》所刊作者名單	145
表（四）孔教報出版會同人居住地分布一覽表	161
表（五）孔教報出版會同人創作次數與其居住地 分布一覽表	16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標

筆者於大學時代就讀臺灣師大國文學系，當時儒學四書經典乃是基礎必修課程，而在擔任實習教師那年與摯友們開設讀書會，共同研讀牟宗三的大部頭——《心體與性體》一書，當時對於新儒家側重宋明理學的討論頗有興趣，而在互相激盪與思辯的過程當中，我漸次感受到我的臺灣意識與臺灣立場與許多自詡為儒學提倡者的政治立場與政治意識的扞格不入，我不禁有著諸多疑問：臺灣意識與臺灣的儒學發展史有無可能有相接合的歷史軌跡或未來發展呢？臺灣儒學的發展真的如同那些儒學民族主義者的論述一般必然與中華民族主義鏈接嗎？臺灣儒學本土化的方向在哪裡呢？而若以後殖民論述或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來研究臺灣儒學，將會有什麼樣的研究成果呢？〔註1〕

中國儒學發展自春秋時代起，打破西周「學在官府」的局面，「士」階層於民間興起私人講學的風氣，而逐漸以「官僚政治」取代「世襲政治」，從而造就了之後諸子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的黃金時期。春秋競逐爭霸，戰國問鼎稱王，諸侯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及被吞併的生存焦慮，促成了這種競相舉士，

〔註1〕在成大中文系所於1997年所舉辦「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集中，日本學者子安宣邦在其發表論文〈從當今日本質問「儒教」〉中曾謂：「我們應當以重新檢討「文化同一性」（即指儒學的文化同一性）的最好機會來看待「後現代」的現在。」子安先生此文也啟發了筆者跳脫儒學民族主義相對立的框架，進而運用後現代思潮甚至是後殖民觀點來思索臺灣儒學問題的契機。

布衣而能佩掛六國丞相印綬，諸侯均尋求治國之道的現象。從先秦儒家一直過渡到西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止，儒學由孔子承襲西周文化而發展出來的仁學體系至孟荀分別以「心」或以「禮」釋「仁」，儒學漸與其他學問諸如道家、陰陽家、墨家、法家相融合，至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儒學，更結合了陰陽五行的觀念，訴說災異讖諱，而自漢初的黃老道家治術之後，董仲舒的儒學體系的確是為「大一統」的漢朝政權服務。

儒學就某種程度上，成為統治階層所構築出來的「上層建築」，它通過成為國家學術主流的舉才機制來促成上下階層的流動，進而維繫國家政權的穩定性，而直至中國近現代的國族認同建構過程中，儒學亦被塑造成中國文化認同中不可動搖的核心價值，近代中國的儒學論述始終帶著中國民族主義的色彩於其中。然而就整個東亞文化圈而言，中國儒學依恃過往中國政權的強大，的確對週遭的邊陲國家發生過重大的影響，諸如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等國，均曾受過儒家學術的「沐浴教化」，而「儒學」在這些國家的發展更顯露出近代中國儒學論述指向中國民族主義的縫隙與破綻，即：儒學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資產，它本不必然與中國的「文化認同」或者「民族認同」扣連在一起。

臺灣的儒（漢）學傳入肇自「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因颱風漂流來臺，沈光文在日加留灣（今臺南縣善化鎮）設帳教學，其間甚至有平埔族人師事之，成為儒（漢）學傳入臺灣的最早紀錄。明鄭入臺，陳永華為推行儒學，更於明朝永曆十九年（西元 1665 年）在臺南建置臺灣最早的孔廟，以促進儒學的推行與番人的教化，清代二百一十二年的統治期間亦以科舉取士，臺灣開臺進士自新竹鄭用錫始，造就了臺灣本地文人士紳階層的興起。晚清中國積弱不振，迭遭列強欺凌，清國政府亦著手進行近代的國族意識建構，亟欲轉移地方與家族等更為堅固的「共同體」概念，而欲以國家為最高的共同體來維繫清國政府的命脈。（註 2）

臺灣儒學發展至清末，帶著早期明末清初經世致用的儒學色彩，乃至後來受閩地朱子學強盛發展之影響，這其中的晚清國族建構的滲入自然不言而喻。中國儒學一直以來帶著早期模糊而近代清晰的國族認同，從孔子「微

〔註 2〕晚清的國族建構論述可參考沈松橋〈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此文收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第 28 期，1997 年 12 月出版，頁 1～77。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的夷夏之防到近代晚清國族的論述建構，中國儒學可說是未曾缺席。而臺灣儒學自沈光文入臺，西元一六五二年以來，也漸次接收了中國儒學所帶來的「文化認同」甚或「國族認同」，當平埔族人捧著儒家經典背誦，當臺灣原住民被分為生番熟番，漢化（國家化）的過程就從未一刻停歇。

然而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在馬關條約中被迫割讓臺澎、遼東等地，而臺灣更在一八九六年乙未割臺的戰役後，進入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歲月。由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殖民地的教育制度，臺灣人的國家認同便被轉移到日本的國家認同上，而在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之間，臺灣儒學曾經起過什麼作用呢？它是反抗日本國族認同的工具嗎？或者是依附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學術勢力呢？中國儒學社會歷來亦曾面臨過中國歷史上異族統治的年代，中國儒學亦曾不斷地修改自身的論述以合理化它在異族統治之下的姿態與作用，臺灣儒學是否也有相近的歷程呢？

就殖民統治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臺灣的漢人所經歷的文化認同與國族認同的轉折，就整個華人歷史來說，都可說是極為獨特且絕無僅有的，而臺灣儒學是否也曾起過「調適」與「重新安置」認同的重要作用呢？日本殖民主亦曾受過儒學的影響，對於儒學的內容並不陌生，而臺灣儒學的發展與日本儒學間究竟有過何種交流與交互影響呢？

日治時代提供了一個臺灣人對於中國文化與國族認同的真空狀態，一個重新轉折、思索以及反省的機會，它是一種「縫隙」，當臺灣儒學論述在這樣的真空狀態之下，它會以何種姿態出現？它如何面對日本國家認同的問題？這些問題都相當值得吾人考察。本文的研究動機正是想要解決上述問題，而研究目標正是想要考察臺灣儒學在日治時代，在日本殖民主的儒學政策底下，它的變異（即與傳統中國儒學的文化認同立場的差異）以及發展狀態。

因著上述的思考，筆者意識到：「臺灣儒學本土化論述的建構」成為筆者未來最為重要的研究關懷，然則要建構論述系統，不可能不回顧與研究過往臺灣儒學的歷史發展軌跡，踏實地面對過往臺灣儒學的論述文字是最適切的做法。而在施懿琳教授的「臺灣古典詩人專題」的研究所課程中，因為施老師的悉心引導，筆者得以認識到自己彰化故鄉的詩人儒者——施梅樵，基於一種對故鄉先輩的景仰與敬意，筆者開始研究他的詩作，從而注意到施梅樵

在日治時代末期所編輯的《孔教報》〔註3〕這份儒學刊物，因著這份對故鄉先賢所編刊物的熱情，也因為施老師的鼓勵，筆者遂決定以《孔教報》之研究作為我碩士論文的主題，而這也是邁向往後臺灣儒學研究的一個起點。

《孔教報》創刊於一九三六年十月，是一儒學漢文月刊，由彰化孔教報事務所創辦，施梅樵任發行人。以目前所見《孔教報》最後刊行的一期——第二卷第九號——加以判斷，《孔教報》至少曾持續發刊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眾所皆知，臺灣總督府曾於一九三七年對於各大報紙暗中施壓，促成廢止漢文的目的，所以《孔教報》與《風月報》及後來一九四一年發刊的《崇聖道德報》等刊物，均曾於禁止漢文使用之後持續以漢文發行。《孔教報》採取會員制，凡是繳納年會費的會員均可收到刊物〔註4〕，也因為閱讀者與投稿者主要以「孔教報出版會」的會員為主，故其發行量與寫作群數量自然無法與動輒發行五、六千份以上的《風月報》等開放性較高的刊物相提並論，但是《孔教報》在日治末期臺灣的文人儒士的文化圈中仍享有一定知名度。孔教報出版會的會則中有六條規定大綱，前三條說明了其名稱、會址本部所在地及採取會員制〔註5〕；第四條：「本會於必需時全島各地得設支部或出張所」說明了施梅樵本人對於《孔教報》此一刊物的發行有預設未來將擴大經營規模的前景，由此亦可知《孔教報》刊行伊始，發行地域仍限於臺灣本島，不若《風月報》等刊物甚至發行至中國、日本與南洋等地；第五條：「本會以漢學為真髓防漢學之衰頹以鼓倡文學涵養日本精神為目的」確立了孔教報的創刊宗旨與主要目的；第六條：「本會互相慎重毋傷本會之名目及修養人格向上之事」表露出會員需自律不可傷害出版會的名譽，帶有儒士須以道德修養為重的色彩。

筆者的問題意識為：究竟在何種時代背景因素下，促使彰化名儒施梅樵毅然決然創立孔教報發行會並發行《孔教報》呢？在將近六百多頁，一百萬

〔註3〕筆者所使用的《孔教報》資料係2006年2月25日於臺北縣中和市臺灣圖書館（前身為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影印。

〔註4〕孔教報出版會會則規定對於不論「普通會員」、「正會員」、「贊助會員」、「名譽會員」，只要繳納年費，則「本會所發刊之孔教報無料配付之事」，都可拿到刊物，再加上《孔教報》是非賣品，主要流通在孔教報出版會的會員之間，因此其流通量與閱讀人口著實是有限，且《孔教報》的文字生產應多是會員之作。

〔註5〕孔教報出版會會則第一條：「本會稱為孔教報出版會」、第二條：「本會本部置於彰化市南郭字南郭七七番地」、第三條：「本會以會員組織之」。

字以上的文字生產中，傳達了何種儒學的理念呢？而編輯兼發行者施梅樵是如何經營這份儒學刊物的呢？《孔教報》中的執筆作者是那些人物呢？他們的生平與背景各為如何？《孔教報》為期約三年的存在，卻巧合地落在臺灣總督府全面禁止漢文的前後，而「以漢學為真髓防漢學之衰頹」的孔教報出版會同人們作出何種因應之策與批判呢？他們在日治中晚期以儒學本位書寫儒學的論述，究竟有何價值？又作何貢獻？凡此種種，皆為筆者所亟欲了解者。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研究範圍

王詩琅曾將日治時代分為三期：①綏撫時期（1895～1919）②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1937）③皇民化時期（1937～1945），而本論文題目所謂「日治中晚期」的分期乃參考此種分期法〔註6〕，即分別將這三個時期稱之日治初期、中期、晚期。孔教報雖然存在的時間僅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此三年間，然而為了考察其完整時代背景以求更寬闊的歷史視野及縱深，本論文將先行爬梳日治中晚期（即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之臺灣儒學史，再聚焦於昭和十一年至昭和十三年孔教報出版會的人物、活動及刊物之文本，而將《孔教報》放在具體的日治中晚期歷史脈絡中來考察。

接著，必須界定「儒學」一詞在本論文中的定義與用法，「儒學」一詞有儒家學術之意，無論是古今何種儒家學術派別，此意主要指士人儒生所探討的儒家學術性的範疇，然則當吾人將「儒學」放回日治時代的具體歷史脈絡中時，「儒學」甚至混雜了「儒教」的色彩，這意味著儒者在一般的常民生活中所面臨的儒學「世俗化」（或庸俗化）的實際問題，事實上，「儒學」本身也因為訴求對象不同，而大致可分做三類①官方的儒學論述、②士人儒生的儒學論述、③民眾百姓的儒學論述：

（一）關於官方儒學論述

若回到日治時代的歷史現場，或可思索日本官方如何看待儒學，早在明

〔註6〕請參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臺灣》，臺北，眾文出版社，1980年，頁11。

治四十四年（1911），日本舊慣調查會所編寫的《臺灣私法》一書中，已將「儒教」列為宗教之一，並如此定義：「儒教是孔子及孟子所祖述的古代聖王教義，內容包括宗教、道德、政治，三者渾然融合成為一大教系。」〔註7〕這樣的定義，其實很精準地指出：中國在清代以前是以天子為中心所建構的政教合一國家。日本在近代建構國族主義時，運用萬世一系的天皇為其國族建構的頂點，亦援引不少儒家學說，亦可視為類似的官方儒學論述。

（二）關於士人的儒學論述

日治時代自一九二〇年代起，臺灣知識份子即引入許多西方新式思潮與文化，從而也造成新舊文人之間的論爭，進而對於儒學有許多正反面的論辯與思索，而無論是學術性的或宗教性的儒學論述，新舊文人均有所著墨。

（三）關於庶民的儒學論述

儒學世俗化的結果自然是儒學宗教化、平民化，日治時代儒、釋、道三教交錯雜揉的合流現象其中，借用了不少儒家的論述資源〔註8〕，這可從日治時代曾盛行的鸞堂與善社看出，許多鸞生透過扶鸞等宗教儀式或宣講儒家經典來教化民眾。

本論文的「儒學」一詞，將採取以第二種儒學論述為主，必要時旁及第一及第三種儒學論述為輔，在這樣的界義之下，實際上亦含有「儒教」意義的使用。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取歷史研究法為主，並將結合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當代民族國家建構論述等社會科學理論，以及近代中國、日本及臺灣儒學論述等學術視野與理論，對於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發展歷史與變異進行探索與思考，而在實際的論文寫作上將有以下三項具體作法：

（一）蒐集原始資料

就《孔教報》現存文本而言，目前臺灣可見的《孔教報》，從昭和十一年（1936）至昭和十二年（1937）的第一號至第十三號（缺第九號），以及昭和

〔註7〕請參見《臺灣私法》二卷上，東京，明治四十四年（1911）八月，頁240。

〔註8〕事實上，以中國儒學史為例，自佛教於西漢末年傳入中國之後，就已經開啓了三教（儒、釋、道）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端倪，而自晉代至宋代，三教如何融合一直都是中國重要的宗教命題。

十三年（1938）發行的第二卷二至九號，在《孔教報》內文中亦未曾提及為何缺少昭和十二年的第九號，而比對昭和十二年的第八號與第十號，其中第十號目錄中有「論詩樂（續前）」的篇章，然而在第八號之目錄中，未見「論詩樂」之篇目，可見昭和十二年所發行的第九號確實存在；另外究竟第二卷第一號是否曾刊行，根據筆者比對昭和十二年第十三號與昭和十三年第二卷第二號的目錄，其中單就目錄而言，幾無太多關聯，均是獨立篇章，故無法判斷是否有第二卷第一號的存在。除非能夠尋得遺漏的部分，否則筆者僅能就目前可見的這些資料來論述《孔教報》中臺灣儒學的變異與發展。

（二）進行田野調查

誠因《孔教報》正文內容所透露的訊息有限，例如具體的孔教報出版會會員名冊可否尋得？會員資料安在否？無具名的文章究竟是編者所寫抑或作者匿名？《孔教報》是否僅有目前臺灣圖書館所藏的篇目而已？施梅樵編輯《孔教報》所遭遇到的困境與心路歷程？或許都有待對施梅樵後人進行田野調查訪問，或可尋得《孔教報》編輯的相關資料，或者施梅樵的編輯日誌、手記或書信等，此即 James Scott 所謂的「隱蔽文本」概念，儘管被支配者在支配者面前會順服他，但不一定在意識型態的層次接受支配者的論述或價值。在翁聖峰於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的〈日據末期的臺灣儒學——以「孔教報」為論述中心〉一文中，針對孔教報出版會第五條大綱時，於上冊頁二十九曾提及：

事實上，本條很清楚交待「以漢學為真髓」、「防漢學之衰頹」、「以鼓倡文學」、「涵養日本精神」為目的，所謂「涵養日本精神」只是它的四大目標之一，而且這點是編者的本意，還是迫於當時面對日本統治者的日本化政策相應的一種「敷衍性」作法，也須要進一步釐清，才可避免錯誤的論斷。

而施懿琳亦曾於同一研討會論文集的上冊中〈日治中晚期臺灣漢儒所面臨的危機及其因應之道——以彰化「崇文社」為例〉一文中，於頁三六六提及：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從「日臺文化融合」的角度來立說，要比站在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來強調漢文化效果來得大些。當然，假如要進一步追問，這些鼓倡日臺親善者，究竟是真心如此？或只是以之為幌子？這恐必須要進一步就撰文者的生平事蹟〔註9〕作考查，

〔註9〕原文作「跡」，誤，逕改之。

才可能有比較客觀、持平的解答，在此不宜遽下斷言。

相當明顯地，兩位論者都遇到了相同的困境，即日治時代的文人儒士們是否珍視或敷衍日本殖民主強加灌輸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或許以非公開言說的「隱蔽文本」來解讀，俾能突破此一研究困境，雖說如此，然而將近七十年前的文獻資料是否保存完好仍在未定之天，「老成凋謝，莫可諮詢」的情形也有可能發生，這必然是本論文在進行田野調查時很有可能面臨的問題。

（三）掌握歷史脈絡與背景

本論文對於《孔教報》之研究，重心在於針對其具體文本內容的探討與分析，並欲說明並彰顯《孔教報》在臺灣儒學史的地位與評價，因此牽涉到的背景知識相當廣泛，諸如中國儒學史與日本儒學史的發展脈絡，另日治時期臺灣歷史中如教育史與儒學史、臺灣總督府對於儒學的政策、近代日本對於儒學概念之認知，這些部分均須掌握。此外，針對孔教報出版會會員將據現有文獻、田調資料成果以及方誌中的人物傳記，整理成孔教報出版會會員資料一覽表，並將分項如姓名、字號、著作等製作圖表，並佐以歷史大事年表，以求精確掌握歷史脈絡。李世偉曾於他個人博士論文（註 10）當中，製成「日據時期臺灣儒教大事紀」，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一、《孔教報》的研究成果回顧與檢討

歷來對於《孔教報》的相關研究相當稀少，就算提及也僅是簡單帶過，直接或間接的研究成果：

（一）在單篇論文方面

僅有翁聖峰的兩篇——〈日據末期的臺灣儒學——以「孔教報」為論述中心〉、〈國教宗教辨——以《孔教報》為論述中心〉，翁聖峰長期關注《孔教報》研究之發展，亦為目前《孔教報》研究成果最豐富的研究者。

（二）在學位論文方面

目前尚未有任何學位論文以《孔教報》為主題進行撰寫，「惟二」在內文

（註 10）請參見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初版，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 年，頁 458～477。